

## 中國的「睡」與「醒」：

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三）<sup>\*</sup>

**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

魯道夫 G. 瓦格納 (Rudolf G. Wagner) 著<sup>\*\*</sup>

鍾 欣 志 譯<sup>\*\*\*</sup>

---

\* 本文原以英文發表於2011年的《跨文化研究》電子學刊，*Transcultural Studies* 1 (2011): 4-139。網址：<http://archiv.ub.uni-heidelberg.de/ojs/index.php/transcultural/issue/view/1077>。經作者本人同意授權本刊，譯為中文，分三期連載刊登。本文為第三部分譯文，第一部分請參見《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3-44；第二部分請參見《東亞觀念史集刊》第2期（2012年6月），頁3-54。

\*\* 作者現任德國海德堡大學中國研究教授暨「全球脈絡下的亞洲與歐洲」菁英研究群協同主持人。

\*\*\* 譯者現任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 六、國家作為有機體之概念的相關討論

至此，我們集中追溯並列舉了以隱喻和插畫為平臺的討論，並見到許多有關國家作用力的概念性討論在不同脈絡中使用了同樣的元素。有意思的是，在這些更為概念性的討論中，不論西方還是遠東地區所獲得的成果，都無法否認隱喻和圖像帶來的助益。

1900年2月，梁啟超發表了夾敘夾議的〈少年中國說〉，文中論及中國這個國家的本質：

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sup>144</sup>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問題也。如其老大也，則是中國為過去之國，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國，而今漸澌滅，他日之命運殆將盡也。如其非老大也，則是中國為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欲斷今日之中國為老大耶？為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

「中國」一詞由「中」與「國」合組而成。在過去，這一名詞意謂「中央諸國」，即戰國時代華北平原各國。十九世紀末，「中國」仍非通行用語，更常用來指稱中國的是「清朝」，或是較為新穎，帶有文化意涵的「中華」，這也是後來時常出現「花國」(flowery kingdom)一語的由來。「老大」或「古老」帝國原先是當時國際上討論中國與鄂圖曼帝國的用語。梁啟超在文中問道，這日漸朽壞的身體，是否仍有回春之日：

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製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

---

<sup>144</sup> 這也是圖二十所使用的辭彙，它指涉了西方對於古老帝國（如鄂圖曼帝國和中國）的現代命運所做的討論。

之國。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國也，自百年以來也。完全成立者，壯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於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斷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爲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爲少年國。

梁啓超筆下以「少年中國之少年」爲代表的「少年中國」，將取代過時的老帝國。中國從未是個真正的國家：

夫古昔之中國者，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或爲家族之國，或爲酋長之國，或爲諸侯封建之國，或爲一王專制之國。雖種類不一，要之，其於國家之體質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sup>145</sup>

在文中其他段落，他以進化論的脈絡建立國體與身體的隱喻，將歷史時期對比身體成長的不同時期。簡言之：在漫畫和各種明喻中爭辯的議題，同時亦爲更加概念性的討論所承繼，且往往出自相同作者之手。

梁啓超自 1900 年起開始對伯倫知理 (Johan Kaspar Bluntschli, 1808-1881) 的著作產生興趣。當時伯倫知理的相關論著可在日本見到日譯本，他將「國家」視爲「有機之整體」的理論，概念化並系統化了十九世紀初以來歐洲——特別是德語地區——的多種研究途徑。伯倫知理的學說將人民對國家總體目標的忠心服膺視爲國家的「有機」本質；在此同時，他也對盧梭「社會契約」之說提出批判。<sup>146</sup> 雖然伯倫知理願意接受某些缺乏公民集體意志的政治實體爲國家，梁啓超卻不滿足於此。還不能稱爲國家的中國，只有符合〈少年中國說〉開出的條件，才有可能成爲國家。前引梁文、伯倫知理的學說以及謝

<sup>145</sup> 梁啓超：〈少年中國說〉，《清議報》第 35 冊，1900 年 2 月 10 日。

<sup>146</sup> Yong Lei, *Auf der Suche nach dem modernen Staat: die Einflüsse der allgemeinen Staatslehre Johann Caspar Bluntschlis auf das Staatsdenken Liang Qichao* [尋求現代國家：伯倫知理的國家理論對梁啓超國家思想的影響] (Frankfurt: Peter Lang, 2010), chap. 2, 95-116.

續泰漫畫的多種變體，全都觸及了國家有機作用力的問題——不論那是虛有其表，還是蕩然無存的作用力。檢測「中國」這個國家存在與否的試劑，便是人民的心態。倘若他們仍舊沉睡，缺乏愛國意志，便無所謂具備有機作用力的中國。

伯倫知理顯然是對1880至1910年間東亞國家概念之形塑最具衝擊效應的作者。<sup>147</sup> 1902年過後，梁啟超徹底轉向伯倫知理強調國家作用的模式（etatist model），此後，許多主張改良的媒體都刊登了以他所提供的概念為框架的文章。中國留日學生出版的《浙江潮》，是改良報刊中時間較早，影響也最大的其中一份，這份刊物便曾為讀者扼要摘述過伯倫知理「國家有機體」的新理論：

雖然，以國家有此等性質而似有機體，則可。若以為全然之有機體，則在今日國家思想發達之時代所必不認也。何則？蓋國家之生存發達，全賴人類之作用，非若有機之物，能以自己固有之力生存而發達也。故謂其國家之或點似有機體之或點，則可，非能全以此為有機體也。要之，國家者，非分子集合體，非有機體，惟似有機體，具有有機的性質，是實最適當最合理之說也。<sup>148</sup>

有機體的隱喻在社會學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著作中也隨處可見，而他對東亞政治中進化思想的形塑十分關鍵。國家和進化主義在此意象中彼此交融。1906年，梁啟超言簡意賅地表述了他對國家的想法，他結合了國家有機體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把國家放入叢林裡：

<sup>147</sup> 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2003年），第3章。

<sup>148</sup> 酉癸：〈國家有機體說〉（Organic theory [sic] of the state），《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18日。參見潘光哲：〈伯倫知理與梁啟超：思想脈絡的考察〉，收於李喜所主編：《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95-301。

國家者，有機體也。既爲有機體，則不得不循生物之公例，以競生存於優勝劣敗之林。<sup>149</sup>

伯倫知理曾明確表示，相對於當時其他學者研究的有機體或蜜蜂、螞蟻等有機集合體，這項解釋所使用的隱喻有其應用上的侷限性。國家的有機性質端視其公民（包括官員）的優劣——也就是這些人有意識地將個人利益忠心服膺於國家利益之下的程度——而定。當範式轉換時，他也接受並不完全符合這項條件的國家。然而，對梁啓超來說，只有滿足此條件，國家才算得上是有機體。梁啓超的國家不受伯倫知理的國際法保護，只能在優勝劣敗的叢林中掙扎求生。

如同我們從伯倫知理和梁啓超的言論所見，關於國家本質的概念性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持續受益於其他以隱喻和意象爲平臺的討論。一般來說，關於概念的討論會隨之而起（而非在其之前），並藉用它們的語言和隱喻。這表示，對於像國家如此重要之團體，行動導向的隱喻和漫畫確實是主要的輿論平臺，而這些隱喻和漫畫所劃定的邊界，也成爲討論純粹概念的框架。

中國已有使用身體隱喻國家的先例可循。不過傳統上，這項隱喻的重點，擺在統治者之於臣子的職分有別，好比頭或心之於身體的其他部位；只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才會涉及國體的有機作用力。<sup>150</sup>但此處所研究的討論中國事務的作者，並未在其文章中顯示出他們有意

<sup>149</sup> 梁啓超：〈開明專制論〉，《新民叢報》第4年第3號（原75號），1906年2月23日。收於張品興主編：《梁啓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冊，頁1469。

<sup>150</sup> 在軍事議論裡，偶爾會強調「人民」心志齊一的重要性。荀子在趙孝成王前，不同意仰賴天時、地利和觀敵變動的用兵策略時，言道：「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見〈議兵篇〉，《荀子集解》（北京：中華出版社，1988年），頁265-266。在荀子看來，軍事力量取決於上下一心，別無二志，但此處所言的晚清論述，並未選擇與過去的討論聯結。進一步關於中國早期的國家隱喻，可參見 Wagner, Rudolf G., “Treating the Body Politic: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Medical Metaphor in China,” in *The Body Metaphor*, ed., Susan Richter (Heidelberg: Springer, 2013).

聯結這批眾所周知的華文隱喻。就跟許多其他領域一樣，外國修辭和討論的規範與威信，足以刺激出改頭換面的影響，而不僅是新舊特色的混雜而已。

## 七、〈時局圖〉、文化仲介與交會區

我們終於得以回到本文一開始討論的那幅 1899 年的漫畫。瞭解了「國族沉睡」在隱喻和形象上的跨文化流動特質後，我們再來檢視漫畫作者謝纘泰的背景，以便理解他在相關交流中的前提以及所擔負的角色為何。

謝纘泰是澳洲籍華裔移民的後代，也是基督徒，他的父親自 1850 年代起便積極參與反滿組織——即謝纘泰日後所謂的「澳大利亞中國獨立黨」(Chinese Independence Party of Australia)<sup>151</sup>——也是「華人致公總堂」(Chinese Masonic Society) 的一員。<sup>152</sup> 謝纘泰似乎也活躍於這兩個組織當中。他們全家在 1887 年移居香港之後，謝纘泰就讀於英語授課的皇仁書院 (Queen's College)，<sup>\*1</sup> 並在畢業後服務於殖民地政府。他行文用英語，但可用廣東話進行口語溝通。

謝纘泰與其他接受外國教育的香港人建立了密切聯繫，他們所使用的主要語言是英語，也都具有革命傾向——其中一位便是何啓 (Ho Kai, 1859-1914)，上文已然討論過他對曾紀澤文章的批判。謝

<sup>151</sup>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24), 7.

<sup>152</sup> Rodney Noonan, “Grafton to Guangzhou: The Revolutionary Journey of Tse Tsan Tai,”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27, no.1-2 (2006): 103. 關於澳洲華人致公總堂，參見 John Fitzgerald, “Revolution and Respectability: Chinese Masons in Australian History,” in *Connected Worlds: History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ed., Ann Curthoys and Marilyn Lake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E-Press, 2005), 89-110.

<sup>\*1</sup> 譯注：此為今名，當時校名則為「中央書院」(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孫中山自 1884 至 1886 年於該校就讀。

纘泰也跟推動中國改良事業的外國人保持密切往來，例如新教傳教士與新聞撰稿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G. E. Morrison，1862-1920）、《德臣西報》編輯黎德（Thomas Reid）、《土蔑西報》編輯鄧勤（Chesney Duncan）等——後面這兩家香港報紙都曾刊登謝纘泰的宣言和投書。<sup>153</sup> 謝纘泰跟日本官員，<sup>154</sup> 乃至寄居日本的中國南方革命人士（例如梁啟超）也都維持緊密聯繫。

謝纘泰和另一位同樣受過教會學校教育且慣用英語的華人楊衢雲（1861-1901）<sup>155</sup> 共同參與創立了一個革命組織，美其名曰「輔仁文社」（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Benevolence），主要活動於香港，1890年時有成員十六位。當孫中山在1895年成立興中會時，輔仁文社併入其內，謝纘泰和楊衢雲為新組織設立了秘密總部。楊衢雲在新會長選舉中當選，孫中山對此極為不滿，但楊衢雲在廣州起義失敗後逃往南非。等到1902年另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謝纘泰也放棄了激烈革命分子的身份，參與創辦了至今仍舊是香港菁英主要訊息來源的英語報紙《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謝纘泰參與編輯該報數年，之後，他寫了一本內容豐富的回憶錄，紀錄自己參加革命的年月，和他對孫中山日益增添的嫌隙。<sup>156</sup> 馮自由的回憶文章是有關這些

<sup>153</sup> A Chinese Sufferer (= Tse Tsan Tai), “Manifesto of the People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Hong Kong Telegraph*, May 30, 1895, 2; Tse Tsan Tai, “A Chinese Protest,” *Hong Kong Telegraph*, May 30, 1894, 2. 鄧勤出版過一本謝纘泰的傳略，見 Chesney Duncan, *Tse Tsan Tai: His Political & Journalistic Career: a Brief Record* (London: Globe Encyclopaedia Co., 1917).

<sup>154</sup> 謝纘泰在有關自己革命活動的回憶錄中表示，對於1895年進行的廣州起義，他曾受過「日本政府透過其領事所給予的秘密協助」。見 Tse, *Chinese Republic*, 9.

<sup>155</sup> Hsueh, C., “Sun Yat-sen, Yang Ch’ü-yün, and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 no.3 (1960): 307.

<sup>156</sup> 見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15. 過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研究忽略了謝纘泰自己提供的資訊，僅僅根據馮自由的《革命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頁62。馮自由翻印了那幅漫畫，並表示其初稿時間為1898年7月，也就是戊戌政變之前，但畫上的日期證實了謝纘

早期革命團體的主要資料之一，他在文章裡詳細描述過謝纘泰的革命活動。

上述傳略涵蓋了謝纘泰的跨文化和跨語際網絡，明顯可看到他與盟友們除了口頭使用廣東話和英語，絕大部分的讀寫都以英語為主。謝纘泰住在香港這個重要的「交會區」裡，在此，外人本身及其帶來的政治、媒體，均使居民日日處於與外國思想、機制、種種實際作為不斷互動的生活中。謝纘泰和他背景或「中」或「西」的盟友們，可以用「文化仲介」加以描述。<sup>157</sup>

這些文化仲介早在養成及教育過程中，便已熟悉國際上有關中國的討論，他們瞭解有哪些隱喻被用來指涉中國的狀態，中國又是以何種形象呈現給世人。這些人——包括布爾傑、黎德、李提摩太、鄧勤和莫理循——熱中心中國事務，盼望推動中國政體儘速改革，方式則從撰文、組織活動至地下行動，不一而足。他們的文化介入層面不限於文字和思想，還包括利用自身的跨文化經驗，將外國機構（主要仿效無政府主義的模式）和政治宣傳（如〈時局圖〉）的形制引進中國脈絡裡。<sup>158</sup> 不論對中國還是對外人社群來說，這些文化仲介在某方面都算局外人，但他們的背景、語言能力以及對於改革中國的強烈認同，使他們對雙方面都產生了異常廣泛的衝擊。

如謝纘泰這樣的華人，皆可仰賴許多——通常手頭寬裕的——華僑對中國共同的強烈關懷。身為活躍於中國社會邊緣地區的文化仲介，他們得以在僑界與中國改革事務間穿針引線。他們的外國友人也在各自國內對中國政策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人士間，發揮了類似的人際

泰自己的說法。參見王雲紅：〈有關《時局圖》的幾個問題〉，《歷史教學》2005年第9期，頁71。

<sup>157</sup> 這個名詞原先用來描述熟悉「白人」文化的「本地人」所扮演的角色，因為他們可以幫忙兩者之間的溝通。此處的借用無意為誰貼上族裔標籤，指的是無關族裔或語言背景，任何勝任此類角色的人。

<sup>158</sup> 當時「宣傳」(propaganda)一語只限於用在基督教的傳教工作，但從本質上來說，〈時局圖〉和圖上的題辭顯然可界定為一種宣傳。

網絡功能。在實際運作上，大部分中國「革命」活動都受到華僑的經濟援助，以及強烈關懷中國事務的西方人士的支持。

「文化仲介」一詞根據的是有關於文化交會議題的討論內容，但更重要的是，它指出了其他用語太過簡單化的情形。過去描述此類人物時，視其衍生意涵而定，常使用兩組不同的語彙：描述中國的情境時普遍使用的是「買辦」，以及據此而來的「買辦意識形態」(comprador ideology)、「買辦愛國主義」(comprador patriotism) 等等，以形容／譴責與外國人過從甚密的本地人，認為他們多半缺乏革命和愛國熱誠。在印度半島的脈絡中，則普遍使用帶有「殖民」或「盎格魯」的詞組。<sup>159</sup> 對於投入東亞或南亞政體改革、教育、翻譯或其他文化工作的外國人，標準語彙則是衍生自「帝國主義」的「文化帝國主義」。<sup>160</sup> 兩組語彙均直接出自將帝國主義和民族國家二分後產生的線性化約主義。在此邏輯之下，「帝國主義」國家的公民不論其思想和行動為何，皆被定義為帝國主義者——除了標準革命分子會因「棄絕」原生（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國家受到稱讚。真正的「本地人」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與愛國的，否則他就是被收買或被洗腦了，終將背叛這些高尚的志向。這套封閉結構需要精巧的解說策略，才有辦法在反對其分析與闡釋能力的壓倒性證據前自圓其說。舉例來說，中亞佛教徒來到中國宣揚佛教信仰，就完全不適用於這套描述。然而，不論「本地的」或「外國的」文化仲介，皆須面對來自周遭對他們忠誠度的質疑。之所以用「仲介」這樣的經濟辭彙比喻這些人，是因為他們的生活（多半是他們的生計）取決於「買」、「賣」雙方不受脅迫的主動意願，而對文化事物來說，金錢往往只是枝微末

<sup>159</sup> Jung-Fang Tsai, “The Predicament of the Comprador Ideologists: He Qi (Ho Kai, 1859-1914) and Hu Liyuan (1847-1916),” *Modern China* 7, no. 2 (April 1981): 191-197.

<sup>160</sup> 這是多年以來的標準用語，例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版品中，提到《申報》這份中國最重要的早期報紙創辦人及編輯美查 (Ernest Major) 時，便是如此。

節。仲介必須熟知雙方在供給和需求上的實力和興趣。

本文討論的群體具備以下優勢：透過報紙、信件和旅人獲取資訊的便利程度；與不同語言的媒體、不同地方的政治活躍分子、不同國家的政府官員保持密切來往；同樣重要地，受到不受清廷轄管的香港（以及很大程度上的上海）的保護。如香港、上海或橫濱這樣的地方，實足視為華語世界的交會區。上述幾位文化仲介本身，或許也可視為活生生的交會區。

「交會區」(contact zone)一詞，原先是人類學者普蕊特(Mary Louise Pratt)用來描述「不同文化相遇、衝突、彼此互搏的社會空間，它通常處於權力高度不對等的脈絡，例如殖民主義、奴隸制度，或其延續至今，並為世界上許多角落所切身經歷的後續影響當中。」<sup>161</sup>她主要研究的物件，是1613年一位接受基督信仰的南美安地斯人寫給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三世的西班牙文書信，而這位安地斯人有可能當過殖民官府的雇員——語言、宗教、官位和收件人等等皆在此交會。

如1860年代至1930年代間香港或上海這樣的交會區具有更多重要面向。相較於別的交會區，它們與內陸之間的落差極大，特別是在媒體的出版與發行；多種外文媒體的販售和訂閱；具備多語能力和跨文化經驗的記者、作者、譯者、編者和讀者；吸引商人來此生活、交易和消費的娛樂；提供些許「現代」政治、文化氣息以及法律保障的各樣機制等方面。它們對內陸居民開放，成為可以在此安全體驗西方的華語社區；同時，它們也對異國商務、旅遊、知識和訊息開放，成為通往「世界」的樞紐。

這些交會區對頗受歡迎的「想像共同體」概念帶來挑戰：「想像共同體」的概念推測國族可由閱讀同樣的刊物凝聚而成，這些交會區卻顯示，公共領域的狀態並不齊質均一，它在沿海都會區和內陸之間

<sup>161</sup> Mary Louise Pratt, "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Profession* 91 (1991): 33-40。  
本文發表後經過多次重印。

具有極大差異。好比許多發展中國家常見的「雙重經濟」，<sup>162</sup> 在1860至1949年間，中國領土上所提供的公眾發聲管道，以及使用這些管道的發言者或受眾，絕大多數都集中在上海，另有一小部分在香港和天津。中國的印刷媒體在1910和1920年代急遽發展後，仍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報紙、期刊和書籍出版於上海。

這些交會區同時顯示，公共領域和民族國家的界線並不一致。以中國來說，交會區腳下所踏的兩條船並非不同的國家，而是中國與「世界」。作為口岸城市，它們與國際線路（航線、纜線）相連，也是中國境內與世界之間交換訊息和輿論的地方。它們的人口主要由華人移民（如謝纘泰）組成，以及一小部分來自其他國家、讀寫其他語言的僑民。<sup>163</sup> 這些交會區的發聲管道使用不同的語言，而發言者和受眾各有各的主要語言。這些小社群或許分別擁有更為靈活的內部溝通方式，但不同程度上的多語共用是這些交會區內的原則，也是區內不同語言、不同族裔的社群能夠彼此溝通，並合組一眾人皆可參與的公共領域的原因——即便參與的密集程度有別。這些交會區的公共領域接收的輿論和訊息既來自世界各地，也來自內陸不同地區。相對地，這些輿論和訊息（和娛樂事項）經過交會區內媒體處理後，既向內陸，也向日漸擴增的國際網絡發送。不論何時，這些流動都是不對等的；在此，流入國內的份量要遠遠大於流向國外的。〈時局圖〉便是很好的例子：該圖製作於香港，其概念和圖像構成則可聯繫至歐美國家、香港和通商口岸的英語媒體上的論述及插畫。

〈時局圖〉所依靠的是十九世紀以來由概念、隱喻及圖像所組

<sup>162</sup> 關於這項概念及其歷史的簡介，參見 Gary Fields, “Dual Economy,” (Working Papers 17, Cornell University ILR School, 2007)，網址：<http://digitalcommons.ilr.cornel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6&context=workingpapers>，檢索日期：2011年2月28日。

<sup>163</sup> 鴉片戰爭以前，港島區和上海國際租界區都無人居住，之後則分別成為殖民地和通商口岸。於是，移居該地的華人跟來自其他地方的人一樣，都可算是移民。

成，已然通行全球的跨語際和跨文化修辭。圖畫本身極為清楚地顯示出此點，它寓言式的表達，與當時在西方和日本已廣為傳布的跨文化圖像緊密結合。謝纘泰在中國借用了這樣的圖像，其他人則拿它用在德國、鄂圖曼帝國或印度。

圖上關於各種動物的題詞只有英文，且預設了讀者熟知英語報刊上的政治事件和政治領袖的言論。能夠從這張圖畫以及其他喻體獲取意涵的讀者，具備了與謝纘泰相同的跨語際和跨文化經驗。之後不同版本的改造、消弭雙語並行、添加按語等手法，則顯示出擴大其讀者群的努力。

換句話說，這張漫畫合乎跨文化傳播的模式：它在重要交會區出版；它利用了報紙這樣的新式媒體，也使用圖像；它的作者是文化仲介的楷模，既投入改革中國的事務，也直接參與國際上涉及中國的討論；它涉及作用力和權力的不對等，並促使人們籌劃相應之道；它出現的時刻非常關鍵，足以在人民對國家危局的認知上產生巨大影響。

1898 年的戊戌政變後，謝纘泰的漫畫連同許多關於中國被人瓜分的論述一股腦地在清廷轄管以外的地方出版，它把歐洲十九世紀所發展出描繪國際政治的圖像學應用在中國。

另外一個涉及同樣主題的例子來自紐約的諷刺期刊《潑克》(*Puck*)，出版時間在〈時局圖〉後不到一個月。這幅 1899 年 8 月的漫畫上，山姆大叔握著一紙與中國簽訂的貿易合約，同時阻擋了剪刀在手，準備割裂中國的列強。這些列強包括英國、俄國、法國、義大利和德國，遠處則是奧地利，而日本卻不在其中（圖十八）。<sup>164</sup>

<sup>164</sup> J. S. Pughe, “Putting his foot down,” *Puck* XLVI no. 1172, August 23, 1899.



圖十八：J. S. Pughe（1870-1909）的〈涉足〉。彩色石版畫，1899年。

山姆大叔（對列強）：「各位先生，這張地圖你們盡量分。

但別忘了，我可不會走，你們不能把我分成一塊塊勢力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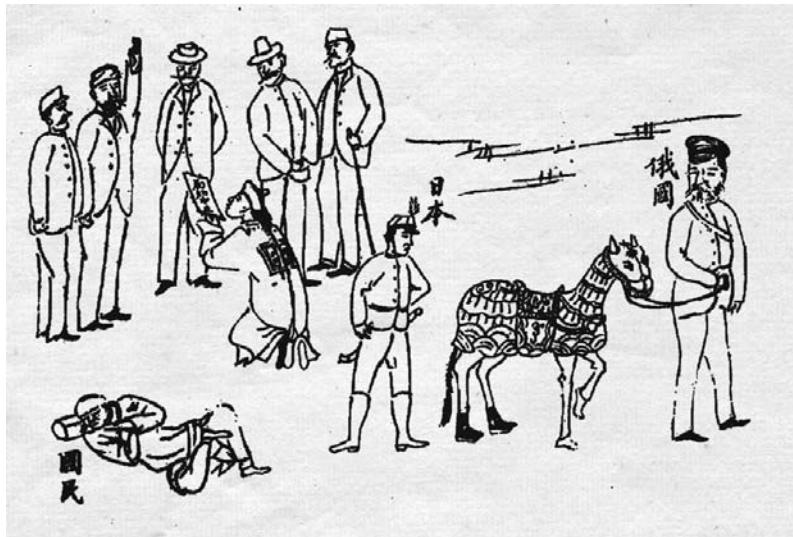
在此形勢裡，中國不過是張列強刀口的死地圖，毫無主權可言。美國處於畫面中央，形成列強的阻礙：他和清廷新簽定了一份貿易合約，取得在其全部領土內通商的權力。此時的美國只有防止中國被瓜分，才能保障其商業利益。國力衰弱至此，中國只能靠列強與美國之間的對立維持領土完整，這也是清朝政府日後善加利用並取得成功的某種機制。

繼1900年外國軍隊入侵，以解除被義和團和回民佔領的北京使館區之後，原本支持仇外行動的清廷逃離了北京。戲劇性的轉折是，清廷接受了幾位漢族高級官員的建議，開始實施層面廣泛的「新政」，包括科舉的改革（1902）與廢止（1905）、學堂與軍隊的改良、體制完善的外務部，以及走向制憲與設立議會的初步措施。雖然政府努力控制輿論，卻管不到香港、上海或橫濱等重要的跨文化交會區，

這些地方的媒體自 1901 年起有了爆炸性的發展，生產的報紙、期刊乃至圖像深入距離出版中心遙遠的中國內陸。這些媒體迅速拋棄了謝纘泰圖中欲語還休的態度，直接討論清廷。

現在，我們將追查「中國沉睡」與「中國甦醒」相關討論在 1900 年後中文刊物的傳布情形。相較於使用隱喻的文本，政治漫畫不論對當權者或對激進分子來說，都更具攻擊性、更有宣傳效果。於是，他們對這類作品的控制或散布皆不遺餘力。

1904 年，改組自前文提及之《俄事警聞》的《警鐘日報》繼承了前身的政治關懷和漫畫手法。該報由蔡元培編輯，同樣對讀者警示北方來自俄國的威脅，以及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此威脅的態度（圖十九）。



圖十九：〈局外中立〉，1904 年。

(右邊的) 俄國正牽走一匹披戴華麗的馬（滿州，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間的) 日本氣惱地注視著。清朝官吏跪在列強面前，保證自

己會對此衝突保持中立，而這項衝突正導向戰爭。<sup>165</sup> 畫面左下角是中國國民，即使俄國正拐走自己的財物，他依然沉睡不醒。

在 1901 至 1909 年的新政期間，「中國沉睡」的隱喻和圖像進一步傳入主流媒體。為了應付突如其來的政治變局，與大眾對此變局日益加增的關注，這些媒體開始吸納許多相關的修辭和先前改良刊物圖文搭配的技巧。《時事報》發行畫報副刊，是率先使用漫畫的「大報」之一。<sup>166</sup> 在創刊後不久的其中一期，該報刊登了一幅圖畫，內容是關於撒哈拉沙漠以南某國的嗜睡症，對中國現狀的隱射不言可喻（圖二十）。

<sup>165</sup> 清朝官員所持文書上寫的「局外中立」一詞，來自 1860 年代日本（荷）蘭學學者對「中立狀態」(neutrality) 的翻譯。它合用了兩個詞組，這兩個詞組曾經分別用於翻譯「中立狀態」的不同面向。前一詞組來自丁體良 (W. A. P. Martin, 1827-1916) 所譯惠頓 (Henry Wheaton, 1785-1848) 的《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後一詞組來自 1868 年西周為他在萊頓的國際法老師微賽琳 (Vissering) 所寫的授課摘要《畢洒林氏萬國公法》。進一步研究參見 Douglas Howland, “Japanese Neutral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rans-Cultural Process,” *Transcultural Studies* 1 (2010): 14-17。

<sup>166</sup> 《時事報》自 1907 年末出版於上海，它的副刊起先稱為《時事報·圖畫旬報》，不久後改名為《圖畫新聞》。



圖二十：〈睡魔醒未〉，1907年。

圖中題詞：「非洲孔哥國人，終日好睡，無所事事，種族凌夷殆盡。歐醫某，得其治療之法，現已醫癒數十人云。按：亞洲之東，亦有一國焉。其人民終日昏昏，似醉似夢。近始翻然覺悟，為專制黨所壓，氣憤不伸，結成鬱疾。現有醫國手六人為之療治，但未識能達目的否也。」<sup>167</sup>

圖中「按語」是針對《圖畫新聞》報導內容的評論。至於圖畫本身，則顯示出十分中國的場景，不但有炕，還有中式人物和服裝。炕上的人從最遠處熟睡的兩位，到畫面下方揮著手，看來精神不錯的那

<sup>167</sup> 進一步關於這幅漫畫的研究，參見俞士玲：〈晚清《圖畫新聞》中一九〇七年的政體改革〉，網址：[http://cathay.ce.cn/history/200908/17t20090817\\_19799922\\_1.shtml](http://cathay.ce.cn/history/200908/17t20090817_19799922_1.shtml)，檢索日期：2011年2月20日。感謝俞教授與我分享此圖。

位，皆處於睡醒之間的不同狀態。醫生的服裝和姿態屬於歐式。按語所暗示的，是奉派出洋的五大臣，他們曾造訪歐洲為中國憲法尋求模範，當時輿論正為此沸騰。五大臣的考察報告剛剛公布不久，並曾經過伍廷芳的編訂，甚至他本人便是第六位撰寫人。<sup>168</sup> 某些「突然」覺醒，卻發現自己受到壓制的人民，指的或許是梁啟超和康有為等1898年的維新黨人。把「亞洲之東一國」與撒哈拉沙漠以南某國——例如被視為「落後」的剛果——相連結，表示中國其實一樣「落後」。

當時最重要的「革命」「大報」是1907年起在上海出版的《神州日報》。<sup>169</sup> 它的廣告篇幅之大，展現了穩固的商業實力，不但如此，其銷售量之高，可達每日一萬份。創始編輯于右任（1879-1964）是當時最熱衷政治的報人之一，也是孫中山的政治組織，即前文提及的同盟會的一員。該報反抗孫中山使其成為黨報的努力，維持了獨立而清楚的「革命」立場，強烈反清。它從蔡元培等人所經營的刊物上承繼了政治漫畫的運用。

《神州日報》的主要畫家是馬星馳（1873-1934），他在1910年也出任《神州畫報》的編輯。馬星馳是山東濟寧的回族人，1893年移居上海，賣畫維生，第二年到廣東協助反滿活動，當時謝纘泰及其友人正協助孫中山策劃起事。他可能見過謝纘泰，但對此我們並無證據。當起事風聲洩漏，清政府開始逮捕行動時，他和孫中山一同離開中國。之後數年，馬星馳多半時間都在歐洲。有報導說他成了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上中國繪畫的代表人，可能他藉此機會認識了一般的西畫技法，特別是政治漫畫的符碼和技巧。

1904年回到上海時，他的經驗與革命聲譽使他成為中國最早的职业漫畫家之一。他對報紙讀者的閱讀習慣以及下一代漫畫家都有重

<sup>168</sup> 參見朱金元：〈試論清末五大臣出洋〉，《學術月刊》1987年第5期，頁68-75。

<sup>169</sup> 該報發行至1947年，它的革命聲譽和信譽使得袁世凱和後來日本佔領當局都亟欲接管。

要影響。<sup>170</sup> 從他在《神州畫報》的許多作品都可看出，他與漫畫世界的發展可說同步並進，而該報卻被認為是「跟隨」西方模式的產物。

馬星馳為《神州日報》的一周年畫了一張描述現狀的主題畫：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外國列強、中國人民以及《神州日報》（圖二一）。



圖二一：馬星馳，〈大夢先覺圖〉，《神州日報》第一週年紀念，1908 年。

畫中場景是「神聖的」中國領土——「神州」——和當頭照耀的「文

<sup>170</sup> 這裡的描述，主要根據山東省省情資料庫裡「濟寧人物」項下提供的材料。網址：<http://sd.infobase.gov.cn/bin/mse.exe?searchword=%u9A6C%u661F%u9A70&K=b8&A=1&rec=1019&list=1&page=20&run=13>，檢索日期：2010 年 11 月 17 日。其中雖然提及他參與籌劃廣州起事，也提到他和孫中山的緊密關係，卻並未提到他和謝纘泰有何聯繫。我尚未證實有關他在巴黎所扮演的角色的訊息。

明」之日。左邊的西方人正踏上神州，臉上的表情「虎視眈眈」，而右邊的滿州官吏僅僅「袖手旁觀」。中間的國民——也就是這塊土地真正的所有人——正陷入酣睡，不論對領土的威脅或是文明的照耀皆不願一顧。對此局勢，率先覺醒的是報紙——特別是《神州日報》。報人手上握著毛筆，上書一「報」字，坐在國民身旁對他「大聲疾呼」，好讓他醒來有所作為。報紙提出的批判正如直指滿州官吏的筆尖，針對的是政府而非列強。

這張圖出版後不久，馬星馳又畫了一系列描繪中國危機的小幅漫畫。畫中，「終日昏昏醉夢間」的題辭下方，坐著一位沉睡的人（圖二二）。



圖二二：馬星馳，〈終日昏昏醉夢間〉，1908 年。這裡沉睡的是「中國之團體」。

當時第一個教師和學生組織剛剛成立，但就連這些協調社會行動的核

心團體都無法遵守他們自己的承諾。

馬星馳時常用沉睡之喻來描繪大眾對外國勢力謀取中國鐵路權一事不加抵制。下面這個版本，將「老」、「大」、「滿州官吏」和「沉睡」等概念匯於一爐（圖二三）。



圖二三：馬星馳，〈外人以鐵道侵略中國之危象〉，1908 年。

外國人利用鐵路進入中國的「瓜」（即領土）內，而「老大（過時）帝國」卻在瓜上沉睡。俄國、日本和英國已控制鐵路，最強壯有力的英國手持瓜刀，準備下手分瓜。左邊的俄國頗具挑釁意味，被（帶著高帽的）英國和右邊的日本盯視著。

同樣的主題也出現在另一幅漫畫上，突顯出「巨人」、「滿州官吏」和「沉睡」等議題（圖二四）。



圖二四：馬星馳，〈橫跨巨人滿州官員的鐵路線〉，1910 年。

雖然民怨主要集中在清廷對鐵路權的處理，最終還導致了 1911 年清朝的滅亡，報上的評論卻持續著墨於國族的沉睡。下面這個例子來自 1910 至 1912 年間雨後春筍般冒出的政治宣傳報刊中的一家，這些報刊絕大多數都增印了圖畫副刊或另外發行畫報，善加利用這項新發現的宣傳工具——政治漫畫（圖二五）。



圖二五：錢病鶴（1879-1944），〈瓜戲〉，1912年。

外人牽起藤蔓，越過中國之「瓜」（即領土），而官員和人民兀自酣睡。

沉睡的隱喻裡，其實帶著有朝一日終將覺醒的內在意涵。雖然吉爾瑞在他〈不列顛女神沉睡〉的畫中文字，已經探討過一時沉睡與沉睡不醒的關聯，梁啟超論及廢置已久的「佛蘭金仙」之獅時，也搬弄過一樣的概念，但死亡依舊是沉睡極端激烈的變體，帶有非常不同的寓意。<sup>\*2</sup> 在吉爾瑞的漫畫裡，其他人試圖讓不列顛女神保持沉睡，意

<sup>\*2</sup> 譯注：關於吉爾瑞的漫畫和梁啟超的「佛蘭金仙」故事，請參見本文第二部分：魯道夫 G. 瓦格納著，鍾欣志譯：〈中國的「睡」與「醒」：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2期（2012年6月），頁11-12、48-49。

指與法國簽訂的亞眠條約是拿破崙入侵英國，及大不列顛喪失主權的前兆。在梁啟超的故事裡，朽壞的「佛蘭金仙」之獅所指涉的並非清朝政府，而是四萬萬中國人民，他們欠缺覺醒所需的條件。這樣的思考路線消解了進一步「革命」行動的意義，自然難以吸引改良派和革命分子。從實用目的來說，「中國這個國家或許已經死亡」的概念更具發展潛力。對此有所探究的還是馬星馳，他再度檢視了列強從中國廣大領土所劃分出的勢力範圍（圖二六）。



圖二六：馬星馳，〈世界之趨勢〉，1908 年。

中國是中間那隻巨大的死蒼蠅，一群螞蟻（日本和俄國）正一口口分食牠北方的腦袋；英國盤踞長江流域肥沃的中段；法國、義大利和德國位於南方，同時，美國、奧地利和其他小螞蟻正趕赴盛宴。蒼蠅若是沒死，不會受到螞蟻如此對待，也不會對螞蟻構成威脅。另一

方面，螞蟻也不可能捕殺蒼蠅，蒼蠅之死完全出自內部因素。

報紙的生命週期很短，讀者很少會記得它的內容。三年後，馬星馳在另一幅關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漫畫中，再次使用了同樣令人心痛的圖像表達國族之間弱肉強食的概念（圖二七）。



圖二七：馬星馳，〈弱肉強食〉，1911 年。

一隻死「土狗」（螻蛄）正被一群螞蟻肢解，土狗是自取滅亡，而非死於螞蟻之手。土狗若是沒死，螞蟻就完全動不了牠。

同一份刊物的漫畫也使用了另一個逐漸成為中國代表的標誌——老虎，以敘述中國過去強盛、如今衰弱的歷史發展（圖二八）。



圖二八：〈中國之今昔觀〉，1911 年。

右上角第一張「康乾時之中國」（十七至十八世紀），畫裡中國這隻老虎威風八面，外國人在牠的吼叫驅趕下四散奔逃；右下角第二張「咸同時之中國」（十九世紀上半）的老虎靜坐不動，手無寸鐵的外國人像小孩子一樣陸續上前逗弄牠；左上角第三張「今日之中國」的老虎依然身形巨大，但外國人對牠就像對「倫敦博物院」裡機括失靈的「佛蘭金仙」之獅；左下角第四張是「將來之中國」，畫中外國人各自雀躍地搬走部分死老虎。這幅漫畫認為，中國並非一貫屈居弱勢，逆來順受；它在十八世紀時依舊活力旺盛，輕易便可抵禦外侮。由於未能細表的內在因素，它自內腐敗，最終徹底喪失作用力。這項對另一種作用力不對等的記憶既稱讚中國的過往，也加強了對中國此時內部狀態的批判。

如本文所言，「中國沉睡」的隱喻進入中文領域的管道，是數種與梁啟超有關的期刊，與此相關的敘事也會路經相似的途徑。像馬星馳這樣在讀者眾多的《神州日報》上反覆使用同一圖像，對於此圖像進入上述交會區及其周遭地方的標準象徵圖像十分關鍵，後者至少為

當地政論人士所熟知。

在所有這些描述裡，中國的衰弱皆為咎由自取，這也是中國改良人士的普遍認知。沒有任何外國勢力被認為有能力造成中國這個大國當時的淒涼處境。中國的危機來自昏睡不醒的人民和政府，前者對「國族」議題毫不關心，後者大部分由一群視中飽私囊為己任的官員組成，只能聽憑外國予取予求。這項推論是應付中國與列強之間權力不對等的辦法之一，據此，危機並非來自原本就比中國強盛的外國列強，而是因為中國內部結構的腐朽為外人開了方便之門。對於大不列顛殖民印度，中國論者也是用內部腐朽的原因加以解釋。雖然這麼說有違時序，但這樣的論調符合日後中國馬克斯主義史學裡的史達林教條，其中認為外部因素只有配合特定內部狀態的時候，才會產生效果。與此同時，這項推論為改良人士與革命分子開啟了一場有意義的行動，使他們勇於挑戰自己日益衰落的政府，卻在列強面前多所閃躲——特別因為這些異議分子想將自己國家體制所導向的「文明」境地，正是以列強為模範。

如前所言，中國語境裡對隱喻和圖像的詮釋，以及構想中或是已付諸實行的作為，不論有何差異，多半仍然是國際上廣闊論辯範疇的一部分，也持續與這些論辯有所互動。這樣的持續互動並非現代特有的現象，舉例來說，它也能在佛教概念、隱喻和造像傳統（及其實踐）進入中亞、南亞、東南亞和東亞地區的歷史中見到。

在此正統論述中，並不包含國族的沉睡既由外人刻意維持，甚且由外人引發——如同吉爾瑞和薩巴奇所繪——這樣的詮釋。<sup>\*3</sup>直到清朝政權的最後數年，才有了異於「中國沉睡實乃咎由自取」這種標準隱喻國族沉睡和共識的例子。此時，「外人引發」的論調開始出現。這種轉向發生的原因有二：中國在 1910 年代借了鉅額外債；同時，

<sup>\*3</sup> 譯注：關於薩巴奇的畫作和詮釋，請參見魯道夫 G. 瓦格納著，鍾欣志譯：〈中國的「睡」與「醒」：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二）〉，頁 12-14。

中國逐漸與國外反鴉片運動同步，最終在 1906 年宣布禁用鴉片。於是，評論家和漫畫家便有機會將外債或鴉片——後者可連結至印度的進口貨和鴉片戰爭——或此二者同時視為外人刻意不讓中國睡獅醒來的辦法。

這方面的佐證我只找到一則，它藏在一個關於馬戲團的故事裡，發表在 1910 年短暫出版過的《芻言報》：

西人言中國爲睡獅。獅而云睡，終有一醒之時。以此語質之西人，西人皆笑而不答，於是乎莫知其何取義矣。後見〔西方馬戲團的〕馴獅者，叩其解。<sup>171</sup>

這位馴獸師本身是西方人，他對這篇文章的作者解釋說，會先讓母狗哺育小獅子，於是等獅子長大後，「則獅形而狗性矣」。不過，若欲進行更大膽的表演，例如把腦袋伸進獅口裡，馴獸師會先塗些鴉片在獅子的食物上，之後逐漸增添藥量。馴獸師解釋道：

「獅則終日昏昏皆在睡夢中，盡人調戲。雖能張拳開口，發聲嗥吼，不過如夢譏而已，實不能咬人。蓋有獅之形，無獅之實，並前之狗性亦無矣。殆將長睡，永無醒時。貴國之大，猶獅之龐然也，受毒之深，奚止於鴉片耶？以此爲譬，庶幾近之。」噫，可懼哉！吾願中國人憬然悟之。

認為中國陷入沉睡的觀感並非自發性的，而是閱讀西方評價後的感想：「西方人都說中國在睡夢中。」不過，如同這則充滿計謀的故事所言，西方人盼望中國繼續沉睡，他們的辦法十分狡猾：中國外表像獅子，吼聲也像，內在卻深陷鴉片之毒，沉睡不醒。這是少數將中國的可悲情狀怪罪於外國人陰謀的一份文本。這項主張以一種頗為間接

<sup>171</sup> 原刊於《芻言報》，發行於 1910 年 11 月至 1911 年 11 月間，由汪康年編輯。此處轉引自單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語境中的醒獅形象〉，《南開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4 期，頁 32-33。

的方式，對前文所述以不同策略應付不對等作用力的言論和圖像添油加醋了一番。

應付不對等有許多辦法，但當所有人都必須以不同方式面對不對等，處於彼此交流或別種關係裡的不同對象之間，仍有其基本差異。找出應付中國沉睡的策略，不只是投身國家改良志士的挑戰，也是列強的挑戰，因為新來到此，急於分一杯羹的俄國、日本、德國和義大利都帶著傳統殖民思想。對掌握優勢的英國及其同盟美國而言，瓜分中國無疑是過於危險、代價過大的選項。1898 至 1900 年間，列強召開了為數不少的會議，或為尋求共識，或為處理中國事務制定規範。本文一開始所討論到謝纘泰畫中動物的題字，便來自這樣的協商。我們再度看到，西方對此種強烈的不對等及其相應之道的觀感，成為圖像的素材。一幅 1900 年的美國漫畫可以為例（圖二九）。



圖二九：〈「醒」後才是真麻煩〉，1900 年。

這幅漫畫幾與時事同步。義和團及其回族同盟在 6 月份開始佔領北京使館區，經過激烈戰鬥，由不同西方國家部隊所組成的救援團破城而

入，最終在8月14日擊潰義和團。清廷早已逃之夭夭。8月15日的《潑克》還來不及刊登這則消息，但已明確預料受清廷扶持的義和團將敗下陣來。

出於各種實際因素，北京被聯軍佔領，清廷流亡，中國就像圖中的龍一樣僵死在地。漫畫的題目語帶雙關，過去有許多關於中國或睡或醒的言論，此時龍死了，需要為牠舉行「守靈」儀式，<sup>\*4</sup>但出席的守靈人並非安靜地哀悼，而是全副武裝地參與儀式——特別是俄國（熊）和英國（獅）。列強國家面對的難題不是中國將醒（那已是過去的威脅），而是中國死後，「靈」前會發生何事。列強會阻止彼此攫取龍肉。漫畫的題目呈現了對於覺醒和死亡的雙重焦慮。龍頭的造型令人想起美國當時攻擊華人移民的海報。<sup>172</sup> 圖像和文字的觀點皆出自外國列強——以這張圖來說是美國之鷹，牠在畫面左上角冷峻地注視眼前景象。處理不好的話，列強恐將在龐大的屍體上開戰。

不久之後，義和團與「中國沉睡」之喻的關聯，又被其中一種最受歡迎的西方媒介——歌劇——加以解讀。在浦契尼（Giacomo Puccini, 1858-1924）1924年過世時仍未完成的《杜蘭朵》（*Turandot*）裡，其中一位丑角大臣「平」（Ping）對於中國公主拒絕嫁給外國王子所引發的亂局感到煩心，他唱道：

噢中國，噢中國  
此刻飽受驚嚇，不得片刻安寧  
而你已在世外安然沉睡了七千世紀！<sup>173</sup>

<sup>\*4</sup> 譯注：英文的「守靈」和「醒來」同樣都是「wake」這個字。

<sup>172</sup> 這些海報可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美國漫畫刊物上見到，參見 Philip P. Choy, Lorraine Dong, Marlon K. Hom, *Coming Man: 19th Century Perceptions of the Chinese*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1994).

<sup>173</sup> Giacomo Puccini, *Turandot*, libretto by Giuseppe Adami and Renato Simoni (New York: Ricordi, 1926), 36. 原義大利文歌詞為：「O China, o China/che or sussulti e trasecoli/inquieta/come dormivi lieta/gonfia dei tuoi settantamila secoli!」感謝 Franco Moretti 提醒我注意這段文本。這場戲Youtube上有一段2009年4月17日Vercelli市公民劇院（Teatro Civico）的演出可

這齣歌劇的對白主要依據高奇（Carlo Gozzi，1720-1806）在1762年創作的同名劇作，但在高奇的劇本裡卻找不到這一段，而浦契尼創作杜蘭朵一角所參照的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1801年改編本裡，同樣未見此段。全劇的故事是，當杜蘭朵公主的外國求婚者回答不出公主的謎語時，便遭到她恣意殺害，沉睡的中國受此攬擾，開始「不得安寧」。這讓人想起1900年義和拳民的仇外主義。杜蘭朵掙扎在擺脫外國／男性支配的渴望與自己對無名王子的暗戀之間，最後，軟化在王子的強力追求下，他揭去杜蘭朵的面罩並親吻她。當杜蘭朵屈服時，王子唱道：「清晨了，清晨了，愛情在陽光下甦醒。」在清晨、甦醒和文明（陽光）的三重隱喻中，杜蘭朵與外國王子的戀情終得綻放。<sup>174</sup>

在「平」的唱詞裡，沉睡的中國祥和且不具威脅性，之所以「飽受驚嚇，不得片刻安寧」，是因為各國王子不停追求所引起的焦慮，而中國對此反應出集體的敵意，正如佛蘭金仙的主題一樣。但這只是暫時性的反應，愛情最後會征服一切。浦契尼將中國的神秘美感、歇斯底里的仇外主義以及對不知名外國人的暗戀三者處理得魅力十足，劇中的王子堅定不移而充滿關愛地試圖贏得公主芳心，但這部作品長久以來為中國所禁。直到2003年，作為中國與「外國王子」主動且正面交往（engagement）<sup>\*5</sup>的符號，這部歌劇才得以在北京故宮（極度大張旗鼓地）上演。

當清政府的新政措施開始顯現成效時，外國記者以當初宣稱中國這條巨龍已死一樣的速度，宣布了牠的復活。1906年，就在《潑克》

供觀賞，「平」一角由 Valerio Garzo 演唱。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8xHOpsXYmg&feature=related>。檢索日期：2011年3月31日。

<sup>174</sup> Giacomo Puccini, *Turandot*, libretto by Giuseppe Adami and Renato Simoni (New York: Ricordi, 1926), 82.

<sup>\*5</sup> 譯注：此處作者使用“engagement”一詞，說明劇中的婚約是中外「約會見面」的象徵。

漫畫的數年之後，佛蘭金仙的意象再度出現。《倫敦畫報》轉載了一幅法國的漫畫，這張畫繼而在英國接續翻印並受到評論（圖三十）。<sup>175</sup>



圖三十：阿塔米昂（Charles Garabed Atamian，1872-1947），〈中國巨人正起身抖去世界床單上的其他國家。出自某法國畫家〉，1906 年。

原本「睡」在中國地圖下的「巨人」日漸甦醒；他面露警覺甚至憤怒之情，此點可視為與佛蘭金仙插畫在形象上的連結。象徵俄國（左上角拿著皮鞭與伏特加瓶）、英國（左邊從西藏滑落至印度）、法國（左下方困在印度支那）和日本（右邊陷入高麗泥沼中）的人物，都從床單上被抖落。德國（在中間）還沒注意到自己背後發生了什麼事，兀自神情傲慢地踏在他的膠州租界上。與這張畫同時刊登的文章強調

<sup>175</sup> 阿塔米昂是位原籍亞美尼亞的畫家，雖然他最知名的作品是 1920 和 1930 年代的圖書插畫，和陽光燦爛的多維爾海灘（Deauville beach）上的女人和小孩，他也畫過不少政治宣傳插畫和圖像，特別是在一次大戰期間。

了中國的現代化部隊、現代服裝、現代刊物和許多現代發明（如電話），表示中國的變化。文章以迫切的警告開頭：

西方的思想終於透入中國的頭腦，看來它很快就會覺醒，並對全世界產生重大影響。沉睡的巨人正在起身，當他抖動世界的床單，各國還是照顧好自己的優越性為妙。畢竟在長久受到排斥後，蓄積的力量將十分驚人。

雖然圖上畫的是中國將列強從自己領土上抖落，英文文本卻堅持表示中國抖動的是「世界的床單」。圖中看不出中國的覺醒有何能夠（或甚至應當加以）避免的辦法，此點加劇了緊張感——不像許多中國的畫作都是為了支援某一特定行動。圖上有的，只是列強的「優越性」——也就是中國和世界領袖國家之間權力不對等的關係——終將不保的不祥預兆。同時，中國的覺醒是「面對西方思想的大覺醒」。這項文化流動的不對等，源自中國逐漸明瞭這些西方思想的用處，並投入精力使其在中國得以運作。簡而言之，文化流動的普遍不對等是反轉權力關係不對等的關鍵因素，而在此反轉中的人為作用力全部來自中國這一邊。用這幅漫畫的話來說，「中國巨人正起身」。

## 八、來日覺醒的幻想

在中國這邊，中國沉睡的字彙與圖像，是認清作用力與權力無可抗拒之不對等的部分方式。如此理解不對等的狀態，不單單是一道認識的過程，還能充分釋放歷史能量，以處理或應付這樣的不對等，甚至將其克服或翻轉。謝纘泰的漫畫以及其他中國作家的多篇文章——尤其是那些努力不懈於翻轉國家將盡氣數的、逃避問題的、怪罪他人的、視其為轉機和養分的——背後，皆受此歷史能量所鼓舞。於此，我們仍須探究另一選項：公眾的烏托邦夢想。

中國改革志士陸續宣稱自己握有「喚醒」中國的主導能力，然而

他們大部分仍致力於挪用「西方的」（當時等同於「現代的」意思）辦法。光是咒罵同胞不夠覺醒與愛國仍有所不足，還得提出保證，讓他們了解覺醒後會發生何事。這項發展也可見於其他國家，好比說德國。我們已經討論過，與沉睡的日爾曼米歇爾在粗糙印刷品上出版的同時，也出現了有關米歇爾醒來的白日夢，偶爾還會在同一年出自同一位畫家之手。<sup>\*6</sup> 在手寫作品中也可看到，對米歇爾沉睡毫不留情的諷刺，同樣伴隨著對於來日日耳曼覺醒的熱烈幻想（圖三一）。



圖三一：R. Sabatky，〈一九四二年〉，白堊彩色石印畫，1842 年。

<sup>\*6</sup> 譯注：參見魯道夫 G. 瓦格納著，鍾欣志譯：〈中國的「睡」與「醒」：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二）〉，頁 12-14。

一位身形壯碩的日耳曼「原人」(Urmensch) 開心地高舉著手中的橡木棍，棍子上頂著普魯士頭盔。他已拋下兵器，與打扮稱頭的法國（人）在爭奪萊茵河一事上言歸於好，當地正處於普天同慶的氣氛中。科隆大教堂終於開始拆除，法國人和日耳曼人圍著自由樹跳舞，樹上掛滿了花環。這幅漫畫的議題在於反對神職人員，而將焦點放在「國族」領土上。圖中看不到社會或科技烏托邦的元素，但強烈期望與法國和平相處。

在中國語境裡，關於中國覺醒最用心炮製的幻想誕生於二十世紀初年，它出現在當時大量湧現的多種政治小說中。中國這些政治小說仿效的是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在1840年代首先用來嘗試改革英國政治體制的一種文體，<sup>176</sup> 它們在報上連載，為中國當時的悲涼處境提供即時性的寓言敘事、脫困之道以及來日的榮景。

清政府在1901年頒布「新政」詔書後進入新政時期，這段時間出現的政治小說，時常在開頭的「楔子」裡置入象徵、寓言或隱喻的符碼。當時英文或日文政治小說並沒有這樣的楔子。如葉凱蒂的研究所示，中國作者為了收束小說文體難以駕馭的特性，才會在開卷處先行勾勒出整篇故事。陳天華的小說《獅子吼》便是很好的例子。<sup>177</sup>

小說中，楔子的第一人稱敘述者為自己國家能否倖存於當時競爭激烈的國際局勢感到憂慮萬分——國家興亡，迫在眉梢。敘述者所處的時間是當下，社會進化被當作自然進化一般來討論，當敘述者（或所代言的作者）出外漫步解悶時，他觀察到「弱肉強食」這條自然界的運作法則同樣主宰著國族的命運。此時他得到一本書，花了幾天解讀內容，發現這本書記載了一支「混沌人種」的衰落。在此書中，楔

<sup>176</sup> Catherine V. Yeh (葉凱蒂), *A Literary Fashion Goes Global: The Political Novel in Late Q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 forthcoming). 我有幸先讀過這部研究的書稿，這方面的資料由此而來。在此文類中，可以見到大量有關中國睡與醒的相似故事。

<sup>177</sup> 陳天華：《獅子吼》（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原刊於《民報》第2-5和7-9期（1906年）。

子彷彿從頭來過，只是換成描述過去的事情，也就是發生在四千五百年前的故事。混沌國原有高度文明，卻為鄰近一小支「野蠻種族」所征服。野蠻人奪走了混沌人的生計，使他們不得婚配，瀕臨滅亡，即便倖存者也逐漸墮落，先變成半野蠻人，而後變成完全的野蠻人，最後成為「無知覺的下等動物」。凡有國家需要勞動人力，或是開戰時需要人肉盾牌，混沌人自是最佳人選。如此過了三百年，這個人種便消失殆盡。這樣的過去是中國可能的一種未來。

如此寓言式地處理了中國三百年來被滿人征服，以及如今全世界雇華工為「苦力」之後，楔子彷彿又重新開始，第一人稱敘事者再度登場，並將讀者拉回當下。敘事者收到俄國侵占中國北方省份，以及英國海軍進入吳淞港的消息，促使他加入抵抗外國侵略者的戰鬥。外敵迅速擊潰中國的反抗勢力，敘事者被迫流亡山野；他的追兵化為一群虎狼。他被這群虎狼撲倒在地，其中一隻咬中他的右臂，痛得他大聲呼號。這聲叫喊製造了戲劇性的效果，一隻沉睡多年的獅子被他喚醒，發出的獅吼震動天地。本書作者注曰：「這一號之功不小。」<sup>178</sup>

此時，當敘事者表達對中國的未來願景，且明顯指涉梁啟超於1902年所著的中國第一部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時，故事出現了第三種時間框架。<sup>179</sup> 進入未來世界的第一人稱敘事者不辨身在何方。他這位來自「過去」的人，對自己所處的大都會中心極為陌生，眼前的繁華將他淹沒：

街廣十丈，都是白石砌成，潔淨無塵；屋宇皆是七層，十二分的華美；街上的電車汽車，往來如織；半空中修著鐵橋，人在上面行走，火車底下又穿著地洞，也有火車行走。正是講不盡富貴繁華，說不盡奇麗巧妙。<sup>180</sup>

<sup>178</sup> 陳天華：《獅子吼》，頁31-32。

<sup>179</sup>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新小說》第1-3以及第7號，1902年11月至1903年1月以及1903年9月。

<sup>180</sup> 陳天華：《獅子吼》，頁32-33。

對第一人稱敘事者來說，這裡只可能是倫敦或巴黎。但當他走進一座大廳，見到懸掛的字樣寫著「光復五十年紀念會」，梁啟超的小說再度成為指涉的對象。此時的中國已有國旗，上面畫著一隻獅子。有齣戲曲正在上演，臺上的男主角名叫「新中國之少年」，戲中詳細回顧著新中國建立前歷經的革命戰史。第一人稱敘事者對這齣戲印象深刻，隨後他又發現另一本書，書名是《光復紀事本末》。不用說，書的封面是一隻張口大吼的獅子。讀者被告知此書分為兩部，前一部談論恢復中國之事，後一部談論重建主權與脫離外國統治。這第二部書，便是讀者手中所持的內容，它代表了不同於一開始那本混沌人歷史所描寫的未來。這第二部書是中國可能覺醒和崛起的未來。

此處我們見到，上述多幅漫畫所使用的材料又以寓言小說的形式參與運作。中國這頭獅子原本沉睡，而已經醒來見到國家實情的人透過痛苦的呼號將牠喚醒，自此走向光榮的未來。這樣的寓言語法已經完全吸收了全球流轉的圖像，其中的認知包括危機的始作俑者在自己國家內部，而非來自外國列強。此時，理想中的讀者不再需要解讀文本內涵的幫手。

## 九、隱喻、圖像與危機

以上討論的種種比喻和圖像皆有其生命歷程。今天的我們看到當年眾所皆知用來指稱現實事物的暗語密集出現，卻不知其解時，此點益加明顯。隱喻、明喻和圖像的運用本身，便展現了所討論的議題有其極度迫切之處，特別是在漫畫的使用尚未成為報刊追求感官效果的一種手段以前。這些修辭上的工具和圖像皆為大眾傳播的形式，傳播的內容大部分依附於迅速加溫的問題，或一般所謂的危機。當社群中的部分成員感到危難臨頭，需要盡速告知大眾——包括國家的當政者——時，它們自然便會出現。唯有如此，才足以發動應付危機所需要的能量，並落實所提出的措施。換句話說，在此情況中出現的圖像

以某種對多數人一目了然的風格，一針見血地描繪了危機的關鍵因素，並且透過印刷或其他大量複製的管道加以散布，同時還為因應方式提出建議。藉由連結許多各不相同的概念與具體可行的步驟，比喻和圖像提供了以情境和行動為依歸的思考平臺，使抽象概念不至成为空想。我提出的假設是，蘊含在這些公開流轉的比喻及圖像裡頭既多元且對象明確的分析，正是抽象概念最初賴以成形的基礎素材。明喻、隱喻、圖像及敘事並不只是這些概念的圖解或說明，它們是概念所汲取的具體素材，並且提供獨立的討論平臺，允許南轅北轍的詮釋空間。

以中國的文本和圖像來說，危機迫在眉梢的表達方式十分多元，文章的標題便是其一，例如梁啟超的〈瓜分危言〉本身就足以成為明喻。1898年德國對山東領土提出要求時，汪康年撰有一文，他在文中抱怨官員遇事推拖，拘泥於繁文縟節：

譬之火發於庭，而彼昏方酣睡於室，疾呼之，猶恐不覺也。汝謂猶當紓徐委婉以出之乎？<sup>181</sup>

當此危機時刻，必須採用迅速和常規外的手段來喚醒中國人民，但這些手段卻為官員所阻擋。就連1900年後，「新政時期」中文改良派刊物所選擇的刊名，都標示著喚醒「人民」的職責。報紙和期刊的名稱——例如上文提及的《警鐘日報》（1904），或是《醒獅》（1905）——就跟它們封面上的圖像同樣清楚明瞭。毫不意外地，梁啟超主編的刊物封面也可看到這樣的例子（圖三二）：

<sup>181</sup> 汪康年：〈論膠州被占事〉，《時務報》第52冊，1898年2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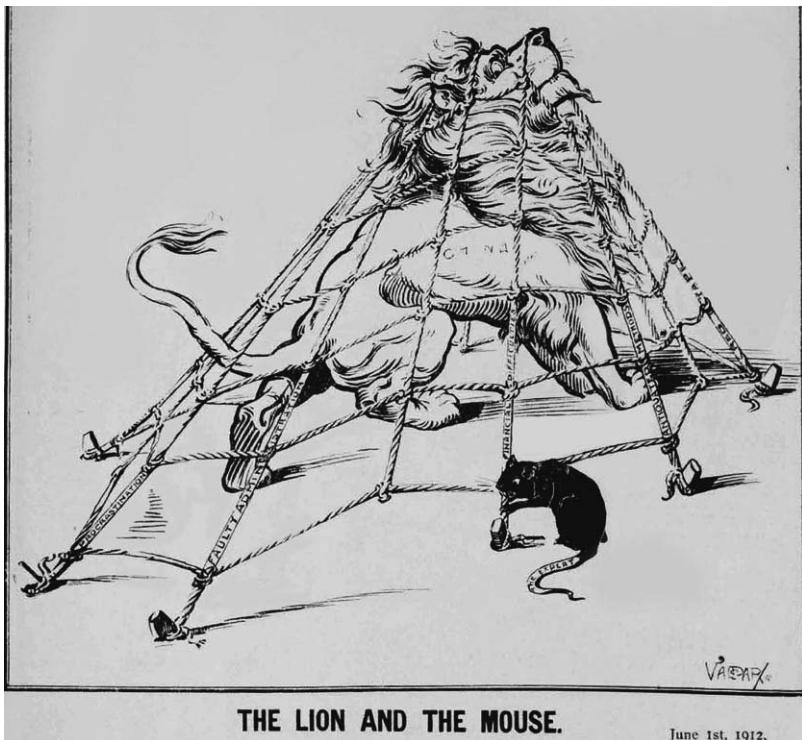


圖三二：梁啟超的《新民叢報》的新封面。

這隻幻想中的獅子本是英國用來虛擬國家的分身，牠以奔騰吼叫的姿態撲向世界。為了對中國「老大」、衰敗的想法——此點在前文轉載的幾幅漫畫裡也有所著墨——表示異議，許多刊名、革命派人士的筆名或小說人名都採用了青年人具有活力、實力、樂於創新的意象，與這張圖上獅子的英姿十分契合。對於青春活潑的形象，可從當時多種跨文化素材的譯本覓得，這些素材皆取自馬志尼的《青年義大利》(*Giovine Italia*) 和迪斯雷利的「青年英格蘭黨」(Young England) 以來歐洲的國族改造運動。

即使有些人將 1912 年民國建立後的中國視為「醒獅」，獅子的意象仍被用來表達尙待突破的困境及相關建議。下面這幅 1912 年

的漫畫出自一位筆名 Valdar 的畫家，晚清民初上海英語刊物《中國公論西報》(National Review) 裡絕大部分的畫作都是他的作品（圖三三）。<sup>182</sup>



圖三三：Valdar，〈獅子與老鼠〉，封面畫，191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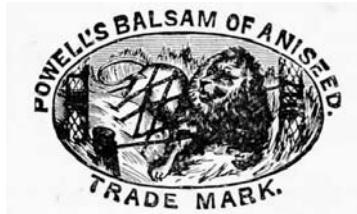
民國成立不過數月，中國這隻獅子已經十分清醒了，但牠困在（左起）「因循苟且」、「行政缺陷」、「經濟困難」、「墨守成規」和「繁文縟節」的網羅下。獅子使盡力氣，依舊無法掙脫這些束縛，只有老鼠——即「外國專家」，牠們對自身利益的興趣或許大過拔刀相助——

<sup>182</sup> 這份期刊與袁世凱的關係十分密切，袁後來當上新成立的民國的總統。

能夠咬斷代表高度經濟箝制的繩索。雖然帶有另一層意思，早在數十年前，中國畫報上刊登的西貨廣告裡，就曾經複製過《伊索寓言》的獅子和老鼠。<sup>183</sup>

此處希望傳達給消費者的是，一小份包威爾氏的香油（老鼠）便能使整個龐大的身軀（困在繩索中的獅子）免於咳嗽之苦。《點石齋畫報》為一則題為〈制獅法〉的報導配上此圖，內容指涉宋朝官員及詩人蘇軾的朋友陳季常的妻子。只要陳季常帶客人回家，陳妻便會發出獅吼，但除此之外，她在婚姻的束縛下也別無他法。在吳友如為

<sup>183</sup> J. Henningsmeier, "The Foreign Sources of *Dianshizhai huabao*, a Nineteenth Century Shanghai Illustrated Magazine," *Ming Qing Yanjiu* (1998): 74-76. 包威爾 (Powell) 在倫敦刊物上持續用這則《伊索寓言》作為同一款 Balsam Aniseed 咳嗽藥的商標。



注釋圖三：Balsam Aniseed 咳嗽藥廣告，1886 年。



注釋圖四：吳友如，〈制獅法〉，1886 年。

《點石齋畫報》所畫的圖像裡，三隻老鼠（蘇軾與友人）愉快地享用著獅子的食物，獅子只能乾瞪眼。

毫無意外地，魯迅這位當時尚未成名的作家（也許只是稍微）提醒了事情可能不盡理想，同時青年積極分子的責任重大。做為對汪康年報導的直接回應，魯迅採用了一則人為自己感官所禁錮的佛教隱喻。他在 1922 年小說集《吶喊》的序言中，對民國覺醒的巨大希望發出了短暫但刺耳的懷疑之聲，這本小說集生動的書名時常被英譯為 *A Call to Arms*（《動員令》）。當他在 1915 年被問及是否願意為一份新開辦的，名為《新青年》的進步期刊提供小說時，他回答道：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sup>184</sup>

這份詢問魯迅是否願意供稿的《新青年》，也對它所見到中國國族的夢遊狀態進行了哲學層面的探索。這種狀態可聯繫至宋明理學的奠基人之一程伊川（1033-1107）的學說，他認為人的本質是「真而靜」。這項主張在 1917 年被視為推崇安穩或平靜的基本守則，從而使人變成「怯弱萎靡」、「勿克完其人格」的「畸人」。《新青年》反對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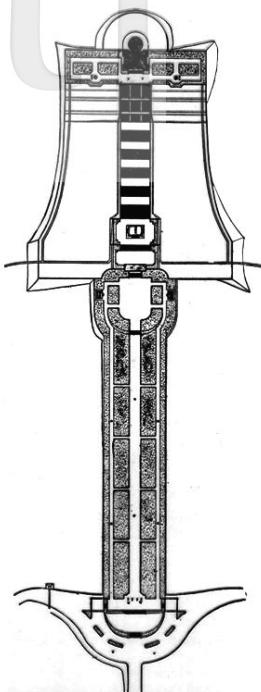
<sup>184</sup> Lu Xun, preface to the collection *Nahan* (December 1922), in *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 trans., Yang Hsien-I and Gladys Ya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0). 這裡指的是出自《妙法蓮華經》關於著火房子的佛教故事。譯注：作者原來引用的是這篇文章的英譯文，此處參見楊澤編：《魯迅小說集》（臺北：洪範書店，1994 年），頁 469。

說，表示「人類之本質厥惟活動」，因為宇宙萬物「既已動始」，「必以動終」。「運動」這個中文裡的新名詞取自日文，中國原本用來表述「體育」，但此時已發生轉義，描述的是政治社會方面的「運動」。<sup>185</sup>在《新青年》扮演過決定性角色的五四運動（1919）之後，中國激進分子和中國政府共同或分別推動了一系列無止無休的「運動」以喚醒民眾。

民國政府後來也表示，自己有責任及能力喚醒中國人民，以嚴厲的監督帶領他們走向光明的未來。它繼承了許多晚清改良及革命人士的意象，但仍舊認為，強調中國沉睡有多悲慘的時期，已隨著民國的建立過去了。為了喚醒國族，它走上一條竭力使用國家機器以達到宣傳目的之路，這種方法類似蘇聯、義大利，以及後來的德國。關於這方面的情況，現在已有十分出色的研究。<sup>186</sup>1929年孫中山下葬於南京時，國民黨政府委託設計的陵墓以鐘形分布的建築和地景，代表了足以喚醒中國人的中山思想（圖三四）。

<sup>185</sup> 進一步的討論請參見 Rudolf Wagner, "Canonization," 74-76.

<sup>186</sup>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陵墓計劃全圖  
(一百三十二)

圖三四：呂彥直，〈陵墓計劃全圖〉，1925年。引自《奉安實錄》。

原本的計畫是在陵墓山坡下建立一座新的首都，將整體政府機關在視覺上轉變為它所設定的政策目標，意即「喚醒」中國大眾，使他們走向現代。<sup>187</sup> 共產黨以各式各樣「運動」挑戰國民黨的共和國，最終得勝，這部分已無需多言。然而，共產黨卻繼承了一項基本概念，即中國人是需要動員方能覺醒的人民。

在中國紛紛擾擾的大小運動裡，人民或國家將會醒來或者需被

<sup>187</sup> 關於這套建築及其景觀設計上的象徵意涵，參見 Rudolf Wagner, “Ritual, Architecture, Politics, and Publicity during the Republic: Enshrining Sun Yat-sen,”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Beaux-Arts*, ed., Jeffrey W. Cody, Nancy S. Steinhardt and Tony Atki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223-278.

「喚醒」這樣的想法，直到今日始終是中國政體概念化以及政治行動合法性當中的關鍵元素。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1925-1999）的讀者眾多，且譯本廣傳，是許多搬弄過中國覺醒之喻的作者之一。他把「靜止的帝國」（l'empire immobile）這樣描述近代中國的詞句，用在一本研究四九年後中國的書名裡，以挑戰那句號稱來自拿破崙，並引起許多爭議的話：「當中國醒來，世界將會顫慄。」<sup>188</sup> 只是，到了2011年，「喚醒中國」仍然未畢其功。<sup>189</sup>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隱喻國難當頭時有人昏睡、有人清醒的不對等情況，背後所持的基本假設並未消失。不過，今天所謂的不對等，已經從面對外國列強時作用力上的差異，轉為標記脫離蒙昧的、進步的意識與行動。1989年6月3日奉派掃蕩天安門廣場的軍人，受命在出發前如此宣誓：

如果能以血醒民，我願把血流乾；如果能以命醒民，我願慷慨赴死。<sup>190</sup>

他們的行動可以是昏睡、受迷惑民眾的鬧鈴，好讓這些民眾覺悟到，國族及其日後的危難正來自於抗議人士。另一方面，我們也在一篇恭喜劉曉波獲頒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的賀詞裡見到同樣的比喻。當時，他先後因被指為1989年學運幕後的「黑手」，以及〈零八憲章〉的起草人之一遭到監禁：

諾貝爾和平獎，以西方文明的道義力量，伸出援手，必將喚醒

<sup>188</sup> Alain Peyrefitte, *L'Empire immobile, ou le choc des mondes. Recit historique* (Paris: Fayard, 1989); Alain Peyrefitte, *Quand la Chine s'éveillera—le monde tremblera: regards sur la voie chinoise* (Paris: Fayard, 1973).

<sup>189</sup> 見 Minxin Pei, "China's Political Awakening," *The Diplomat*, July 14, 2010, 網址：<http://the-diplomat.com/2010/07/14/china%E2%80%99s-politicalawakening/>，檢索日期：2011年2月10日。

<sup>190</sup> 解犀、施路：〈平暴「備忘錄」——兼答「戒嚴部隊不入城是否會發生反革命暴亂」等疑問〉，《人民日報》，1989年7月26日，第1版。

國人沉睡的良知，解放被物慾綑綁的精神，奮起尋求突破僵局之路。在此結束帝制的辛亥革命百年之際，重燃第一個亞洲共和國的聖火，洗脫專制大國的恥辱。這塊諾貝爾金牌就是中華民族踏上民主征途的里程碑。<sup>191</sup>

## 十、結論

我將從本文所分析之案例出發（但不以此為限），提出一系列論點當做結論。我將這些論點視為可被推翻的假設，它們涉及以下三個層面：政治概念、隱喻和圖像之間的關係；政治隱喻的跨語際流動以及政治圖像的跨文化流動；認識並應付諸般不對等的動能。

### （一）政治概念、隱喻和圖像

- 1 隱喻和圖像是思索並建立概念與空間、時間、行動之間關聯的有效工具。
- 2 隱喻和圖像是獨樹一格的平臺，用來處理複雜多變的情況，或多或少導向特定的行動方針，並使其受到認可。它們有些隨意地與概念互動，在題解說明的部分特別如此，但若作者或藝術家覺得實際情況已經超出原本隱喻或圖像所及，它們更易於轉成相關隱喻（例如從「睡」轉成「衰弱」或「死亡」）。
- 3 文字隱喻迫切需要圖解，漫畫圖像也迫切需要文字題解。圖畫可能利用隱喻裡暗示的圖像，而圖畫的題解可能使用隱喻

<sup>191</sup> Jin Zhong, “Medal Conten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12, 2010. [譯注：作者引用的是這篇文章在《南華早報》上的英譯，此處則錄自中文原文。參見金鐘：〈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開放雜誌》聲明〉，《開放雜誌》（香港），2010年11月號，頁17。] 在臺灣，睡與醒的對照亦會被民進黨用來批評馬英九的大陸政策，參見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ubwYeCgxZdA&feature=related>，檢索日期：2011年3月31日。

或概念以揭露含意。

- 4 屬於公共知識的隱喻和（印刷時代的）圖像清楚描繪現況，建議行動方針，而相關知識為抽象概念的產生提供相當份量的材料和經驗；這些具體的表現形式將抽象概念轉化為潛力強大的政治發動機。如此，便可進而假設：概念的普及總在隱喻或視覺的傳達之後，而非在前，並且這些源頭在概念的討論中依稀可見。
- 5 隱喻和圖像往往關注特定時空裡十萬火急的情況。它們影響受眾的方式，是提出急切需要的實際行動。以本文研究的案例來說，它們意在喚醒為國奉獻的意識，採用的策略則是使受眾／觀賞者知恥，從而投身其中，同時也展現可能達到的烏托邦境界。
- 6 隱喻、明喻和圖像以圖像學（iconographic）而非語意學（semantic）的方式運作。如此，便為問題發生場合的界定——以本文來說，問題發生在國族／政府／菁英／王朝的心態，而非外國列強身上——及需要採取的行動預設了論辯上的框架。

## （二）跨語際和跨文化流動

- 1 概念、隱喻和圖像的遷移，均不以語言和文化上的疆域為界。
- 2 對於政治上的概念、隱喻和圖像，十九世紀的發展創造了日益普及、穿越語言和文化的經典，形成某種地下世界語（underground Esperanto），或者保守一點來說，某種跨語際的潛規則——之所以用地下或潛藏來形容它，是因為表面上所呈現的文本、所採用的隱喻和圖像往往因地制宜，各不相同。

- 3 推動這方面跨語際和跨文化流動的是：圖文媒體環繞全球的散播；熟悉某個可以稱為「自己的」國家，且同樣了解發生在「世界上」所進行的圖文公共論述的文化仲介；交會區內——例如口岸，或過去的宮廷或宗教中心——的跨語際和跨文化活動。
- 4 特定領域和區域裡跨語際和跨文化流動的速度、重點與強烈程度，取決於相關議題在當時的「溫度」。當危機加溫時，流動的速度、重點與強度易於上升，而這些巔峰期可被稱為大規模跨文化流動的時期。
- 5 大規模跨文化流動時期的特徵，不僅僅是將外國概念、隱喻和圖像「翻譯」成擁有一套根深蒂固的文法、修辭與圖像經典的地方性圖文。許多時候，最後引進的語言、修辭和視覺材料全然重塑了在地的語言、修辭及圖像。
- 6 如此大規模跨文化流動的前提，是一套經過時間積累後，足以產生源源不絕可供流動素材的外部資源（如文本、圖像、思想模式、機制與實踐）。
- 7 主導這些流動的作用力，並非來自外界的推力或強行置入，而是來自內部扮演文化仲介角色者的拉力。不論語境為何，這些仲介者均來自不同族群、國籍和語言背景。他們的行動或者出於個人喜好、政治或宗教情懷、社會政治立場，或者意在謀生，亦或以上兼具。
- 8 這些仲介者的作用力取決於「市場機運」，也就是他們的文化產品（翻譯、圖像等等）需要買主或擁護者。這意味著，拉動文化之流的最後一份被動的作用力（ultimate and passive agency），掌握在一群無聲無名的潛在顧客之手。他們最終受到注意或被忽略，便是機運的考驗。
- 9 跨語際和跨文化流動中所傳遞的素材，包含了媒體的內容與運作，它們在順利的情況下，將透過印刷或其他具體媒介或

人物，從仲介者和交會區往內陸散播。這樣的散播凸顯出，公共領域內密度極不平均的情況十分普遍，甚至到了成為雙重公共領域的地步，它的一部分與全球性流動同氣連枝，屬於內陸的另一部分卻與之頗為斷裂，只能仰賴交會區的鼻息。

### (三) 認識並應付諸般不對等的動能

- 1 無論何時，概念、隱喻和圖像的流動，都具有質、量交換不對等的特徵。本文研究的案例中，概念、隱喻和圖像既是跨文化之流的一部分，也塑造了這方面不對等的議題。
- 2 彼此交換或雙向流動中如此的不對等情況，有時（但不必然）與權力關係上的不對等同步。
- 3 文化之間不對等的流動一旦被察覺，將釋放出巨大的能量與之相應。這些相應之道可能包括遷往「他者」之地、學習外語和結交外國友人，乃至否認不對等的存在與恐外症(xenophobia)；在另一方面，也可能包括帝國的傲慢、利用權力不對等以維護文化流動的不對等，乃至投身促使「他者」改良、認同屈居劣勢的一邊。明確來說，「中國沉睡」的隱喻，尤其是將中國喻為一頭睡獅或是一位沉睡的巨人，為的是在概念上掌握面對列強時，作用力與權力錯綜複雜的不對等及不穩定性。對此不對等的認知，以及相應而生的歷史能量，端視個人認同於哪一邊而異。對於認同身處艱困環境的「沉睡中國」的發言人／藝術家／觀賞者來說，他們渴望達成的，而最後也可能成就的，是使人致力於「喚醒」沉睡中的巨人，以及——根據個人解讀——明瞭巨人潛藏的能耐、弭平或逆轉作用力與權力的不對等，或是迴避這項議題。對於認同周邊列強的發言人／藝術家／觀賞者，他們在

隱喻和圖像中呈現的企圖，同時也可能推動的，是讓中國繼續沉睡，以便保持作用力與權力的不對等，同時為中國一旦沉睡不醒時，在戰利品上的爭奪有所準備，或是完全相反地走上一條烏托邦的道路，主動為消弭隨處可見的不對等做出貢獻。

- 4 關係上的不對等（例如權力）與流動上的不對等（例如概念、機制和實踐）彼此並不相始終，兩者通常具有相反的主導方向，但持續保持互動。
- 5 在中國與日本的情況裡，拉動國內選擇、翻譯和挪用西方概念、機制、實踐和圖像的能量，在察覺權力關係隨著國家作用力一同落入不對等境地後得到釋放。此後，衰弱的作用力將透過大量翻譯這些概念、機制、實踐獲得補強——它們被視為對手之所以具有較強作用力乃至權力的根基。在反向的例證中，佔有優勢權力的征服者選擇（或是一開始便受其吸引）某個他們視為優勢的文化（例如羅馬菁英對待希臘語言文化，或是滿人對待中國語言文化的態度），並致力賦予此異文化及其代理人（例如藝術家、詩人和學者）地位，讓他們提升生活品質的同時，不會對權力關係的不對等構成威脅。

（責任編輯：余玟欣）

## 徵引書目

《人民日報》

《時務報》

《浙江潮》

《清議報》

《新小說》

《新民叢報》

〈濟寧人物〉，山東省省情資料庫。網址：<http://sd.infobase.gov/bin/mse.exe?searchword=%u9A6C%u661F%u9A70&K=b8&A=1&rec=1019&list=1&page=20&run=13>。檢索日期：2010年11月17日。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興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出版社，1988年。

王雲紅：〈有關《時局圖》的幾個問題〉，《歷史教學》2005年第9期，頁71-75。

朱金元：〈試論清末五大臣出洋〉，《學術月刊》1987年第5期，頁68-75。

金鐘：〈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開放雜誌》聲明〉，《開放雜誌》(香港)，2010年11月，頁17。

俞士玲：〈晚清《圖畫新聞》中一九〇七年的政體改革〉，網址：[http://cathay.ce.cn/history/200908/17/t20090817\\_19799922\\_1.shtml](http://cathay.ce.cn/history/200908/17/t20090817_19799922_1.shtml)。檢索日期：2011年2月20日。

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陳天華：《獅子吼》，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單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語境中的醒獅形象〉，《南開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頁29-36。

馮自由：《革命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潘光哲：〈伯倫知理與梁啟超：思想脈絡的考察〉，收於李喜所主編：  
《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295-301。

鄭匡民：《梁啟超啓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3年。

Choy, Philip P., Lorraine Dong and Marlon K. Hom. *Coming Man: 19th  
Century Perceptions of the Chinese*.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1994.

Duncan, Chesney. *Tse Tsan Tai: His Political & Journalistic Career: a  
Brief Record*. London: Globe Encyclopaedia Co., 1917.

Fields, Gary. "Dual Economy." Working Papers 17, Cornell University  
ILR School, 2007. [http://digitalcommons.ilr.cornell.edu/cgi/  
viewcontent.cgi?article=1016&context=workingpapers](http://digitalcommons.ilr.cornel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6&context=workingpapers)

Fitzgerald, John.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Fitzgerald, John. "Revolution and Respectability: Chinese Masons in  
Australian History." In *Connected Worlds: History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eds., Ann Curthoys and Marilyn Lake, 89-110.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E-Press, 2005.

Harrison, Henrietta.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enningsmeier, Julia. "The Foreign Sources of Dianshizhai huabao, a  
Nineteenth Century Shanghai Illustrated Magazine." *Ming Qing  
Yanjiu* (1998): 59-91.

*Hong Kong Telegraph*.

Howland, Douglas. "Japanese Neutral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ranscultural Process." *Transcultural Studies* 1

(2010): 14-37.

Hsueh, Chün-Tu. "Sun Yat-sen, Yang Ch'ü-yün, and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 3 (May 1960): 307-318.

Lei, Yong. *Auf der Suche nach dem modernen Staat: die Einflüsse der allgemeinen Staatslehre Johann Caspar Bluntschlis auf das Staatsdenken Liang Qichaos*. Frankfurt/M: Peter Lang, 2010.

Lu, Xun. *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 trans., Yang Hsien-I and Gladys Ya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0.

Noonan, Rodney. "Grafton to Guangzhou: The Revolutionary Journey of Tse Tsan Tai."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27, 1-2 (2006): 101-115.

Pei, Minxin. "China's Political Awakening." *The Diplomat*, July 14, 2010. <http://the-diplomat.com/2010/07/14/china%E2%80%99s-politicalawakening/>

Peyrefitte, Alain. *Quand la Chine s'éveillera—le monde tremblera: regards sur la voie chinoise*. Paris: Fayard, 1973.

Peyrefitte, Alain. *L'Empire immobile, ou le choc des mondes. Recit historique*. Paris: Fayard, 1989.

Pratt, Mary Louise. "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Profession* 91 (1991): 33-40.

Puccini, Giacomo. *Turandot*, Libretto by Giuseppe Adami and Renato Simoni. New York: Ricordi, 1926.

*Puck*.

Richter, Susan, ed. *The Body Metaphor*. Heidelberg: Springer, 2013.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sai, Jung-Fang. "The Predicament of the Comprador Ideologists: He Qi (Ho Kai, 1859-1914) and Hu Liyuan (1847-1916)." *Modern China* 7,

- 2 (April 1981): 191-225.
-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24.
- Wagner, Rudolf. "Canonization of May Fourth." In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eds.,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66-122. Cambridge: Harvard East Asia Center, 2002.
- Wagner, Rudolf. "Ritual, Architecture, Politics, and Publicity during the Republic: Enshrining Sun Yat-sen."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Beaux-Arts*, eds., Jeffrey W. Cody, Nancy S. Steinhardt and Tony Atkin, 223-27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 Yeh, Catherine V. *A Literary Fashion Goes Global: The Political Novel in Late Q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 forthcoming.

## 圖錄

圖一：謝纘泰（1872-1937）：〈時局全圖〉，香港：1899年7月。網址：[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Politcal\\_Map\\_of\\_19th\\_Century\\_China%EF%BC%88%E6%99%82%E5%B1%80%E5%85%A8%E5%9C%96%EF%BC%89.jpg](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Politcal_Map_of_19th_Century_China%EF%BC%88%E6%99%82%E5%B1%80%E5%85%A8%E5%9C%96%EF%BC%89.jpg)。檢索日期：2011年4月4日。

圖二：〈時局圖〉，日本（？）：1899或1900年，美國國家檔案（US National Archive）。網址：<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E6%97%B6%E5%B1%80%E5%9B%BE.jpg>。檢索日期：2011年4月4日。

圖三：〈時局圖〉明信片，香港：1899或1900年。私人收藏。

圖四：〈時局圖〉，（水彩？）手繪，Hon Kwong 攝於黃遵憲故居。私人收藏。

圖五：〈瓜分中國圖〉，《俄事警聞》第1號，1903年12月15日，第8版，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圖書館。

圖六：曲線圖。

圖七：〈對1778年2月國勢的看法〉蝕刻畫法文說明，標題來自英國雜誌 *Westminster Magazine*，1778年3月。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來源：Digital ID: cph 3a17996。網址：<http://hdl.loc.gov/loc.pnp/cph.3a17996>。檢索日期：2011年4月4日。

圖八：〈第三階級的覺醒〉蝕刻畫手工著色（1789年）。美國國會圖書館。網址：<http://www.loc.gov/pictures/item/2009633461/> 檢索日期：2011年1月30日。

圖九：Laurent Midart：〈瑞士人的覺醒〉。網址：[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idart\\_R%C3%A9veil\\_1798.jpg](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idart_R%C3%A9veil_1798.jpg) 檢索日期：2011年1月25日。

圖十：James Gillray：〈育嬰——不列顛女神沉睡「和平」中〉手工著色，來自雜誌 *London und Paris*，1802年10月。哥廷根大學圖書館。

圖十一：R. Sabatky：〈德國佬米歇爾〉白堊石印畫，柏林：Julius Springer，1843年，來自 Herrmann von Helmholtz Zentrum fuer Kulturtechnik。網址：<http://www2.hu-berlin.de/kulturtechnik/kabinette.php?show=odm&month=200703>。檢索日期：2011年1月25日。

圖十二：W. Winckler：〈無題（甦醒的米歇爾）〉石印畫，柯尼斯堡：1843年。來自科隆 *Rheinisches Bildarchiv* ([www.museenkoeln.de/rba.de](http://www.museenkoeln.de/rba.de))。

圖十三：《上海幽默畫報》，1872年2月1日。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圖書館。

圖十四：最初的埃及人民……懲罰……埃及的精神自長久沉睡中醒來，驅逐邪惡的官員，杜霏克及其黨羽落荒而逃，1881年。法

語與阿拉伯文雙語諷刺刊物 *Abou Naddara* 6, no.2 (1882)。海德堡大學 Library of the Cluster of Excellence “Asia and Europe in a Global Context: Shifting Asymmetries in Cultural Flows”。

圖十五：Jacques Rawson (?)：〈土耳其之今日〉奄奄一息之病夫國，《東方雜誌》，1920年8月15日，頁33。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圖十六：〈身處小人國的格理弗〉，1727年，來自1727年版的 Jonathan Swift, *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nations of the world, by Lemuel Gulliver*. London: printed for Benj. Motte, at the Middle Temple Gate in Fleet-Street, 30.

圖十七：〈外國人夢中囁語〉，日本：1884年，來自日本漫畫雜誌《團團珍聞》(Marumaru chinbun)。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圖書館。

圖十八：J. S. Pughe (1870-1909)：〈涉足〉，山姆大叔（對列強）：「各位先生，這張地圖你們盡量分。但別忘了，我可不會走，你們不能把我分成一塊塊勢力範圍。」彩色石版畫，《潑克》第1172號，1899年8月23日。哈佛大學 Widener 紀念圖書館。

圖十九：〈局外中立〉，《警鐘日報》，1904年3月19日。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圖書館。

圖二十：李樹函 (?)：〈睡魔醒未〉，《圖畫新聞》，1907年11月。《劉精民收藏光緒老畫刊——晚清社會的《圖畫新聞》》，北京：中國文聯，2005年。

圖二一：馬星馳：〈大夢先覺圖〉，《神州日報》，1908年3月1日。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圖二二：馬星馳：〈終日昏昏醉夢間〉這裡沉睡的是「中國之團體」，《神州畫報》，1908年7月。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圖二三：馬星馳：〈外人以鐵道侵略中國之危象〉，《神州日報》，1908年4月14日。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圖二四：馬星馳：〈橫跨巨人滿州官員的鐵路線〉，《神州畫報》，1910

年。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圖二五：錢病鶴（1879-1944）：〈瓜戲〉，《民權畫報》，1912年。《清代報刊圖畫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年。

圖二六：馬星馳：〈世界之趨勢〉，《神州日報》，1908年9月22日。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圖二七：馬星馳：〈弱肉強食〉，《神州日報》，1911年。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圖二八：〈中國之今昔觀〉，《神州日報》，1911年3月5日。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圖二九：〈「醒」後才是真麻煩〉，《潑克》，紐約：1900年8月15日。  
耶魯大學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圖書館。

圖三十：阿塔米昂（Charles Garabed Atamian，1872-1947）：〈中國巨人正起身抖去世界床單上的其他國家。出自某法國畫家〉，《倫敦畫報》，1906年12月8日，頁858。哈佛大學 Widener 紀念圖書館。

圖三一：R. Sabatky：〈一九四二年〉白堊彩色石印畫，柏林：Julius Springer，1842年，Rheinisches Stadtarchiv 授權複印。

圖三二：《新民叢報》的新封面，橫濱：1903年。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圖三三：Valdar：〈獅子與老鼠〉封面畫，上海：1912年6月1日。  
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圖書館。

圖三四：呂彥直：〈陵墓計劃全圖〉，1925年，出自《奉安實錄》，南京：1928，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圖書館。

注釋圖一：〈低地國的母牛〉版畫，出自 Robert Philippe, *Political Graphics: Art as a Weapon*. New York: Abbeville Press, 1980, 65.

注釋圖二：法國人對 Riaz 說：「牛太瘦了，你跟英國人一滴奶都沒留下。」取自 *Le Flutiste* (= *Le Journal d'Abou Naddara*)，1880年。

注釋圖三：Balsam Aniseed 咳嗽藥廣告。引自《倫敦新聞畫報》

(*Illustrated London News*)，1886年11月。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圖書館。

注釋圖四：吳友如：〈制獅法〉，《點石齋畫報》，己集，1886年3月。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圖書館。